

文史知识



古代社会的吏员
争奇斗异话发式
古代绝命辞纵览
释“面首”

吴吉远
王恩厚
章尚正
沈玉成

9

中华书局

WEN SHI ZHI SHI

1993



医药学院610 2 01478704

文史知识

1993 年第 9 期

(总第 147 期)

· 治学之道 ·

从事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几点体会 韩兆琦 3

· 文学史百题 · 古代论说文的起源和发展 伊北风 10

· 历史百题 · 古代社会的吏员 吴吉远 18

· 文史研究动态 · 近年来骈文研究述要 莫道才 25

文化

争奇斗异话发式 王恩厚 29

史

百褶裙与铜鼓关系谈 盘福东 赵戈茸 34

知识

汉代的饮酒习俗(下) 陈爱平 37

唐代长安的胡食风尚 张庆 44

· 中外科技交流漫话 ·

中菲科技的因缘 汪前进 48

· 中外文化交流与比较 ·

明清欧人对中国文献的研究和翻译(三) 吴孟雪 56

· 德国的汉学研究(10) ·

战后的残局和汉学的重建 张国刚 63

{ 人物春秋 }	才子袁枚	王英志	69
	孙之獬与蕤发令	石业华	74
	近代杰出外交家黎庶昌	钟安西	77

古代绝命辞纵览	章尚正	83
---------	-----	----

{ 诗文欣赏 }	时空交感 顾盼神飞		
	——杜甫《阙题绝句四首》之一解读	刘坦宾	89
	为问新愁 何事年年有		
	——冯延巳《鹊踏枝》赏析	李 萱	92
	层递琴中韵 婉转意精新		
	——读贺铸《小重山》词	徐祝林 李笑野	96

{ 读书札记 }	何物“枳首蛇”	周士琦	99
	沈万三并非死于明初	伯 骅	103

· 青年园地 ·	略论秦汉的相权	张凯声	106
----------	---------	-----	-----

{ 语言知识 }	释“面首”	沈玉成	111
	《史记》中同义词运用的特色	方文一	113

稀世之珍——清乾隆各色彩白大瓶(封面)	118
---------------------	-----

· 文史古迹 ·		
	独具魅力的西山八大处	乔 红 119

· 文学人物画廊 ·		
	应伯爵和他的混饭术	徐景洲 123

· 补白 5 则 ·	中国伊斯兰教史的分期(9)诗心文心的知音(55)远古时期的外治法(76)黄侃先生《说文笺讲》整理出版(112)老子社会理想的世界性(127)	
------------	--	--

《人物故事图册》之四(明·仇英)(封二)	北京西山八大处(封三)
----------------------	-------------



从事古典文学教学 与研究的几点体会

· 治学之道 ·

韩兆琦

韩兆琦，男，天津市静海县人。1955年毕业于河北省天津师范，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62年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而后回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著有《史记选注集说》、《史记评议赏析》、《史记通论》、《史记选注汇评》、《汉代散文史》、《中国传记文学史》、《汉魏南北朝诗选》、《唐宋古诗选》、《历代诗英华》、《资治通鉴新注》等十六种。

我是一个古典文学教师，已经在高等院校的中文系任教三十多年，长期以来，我的教学颇受听课学生的欢迎，曾多次获得过校、系以及北京市级的奖励。在这期间我也同时进行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研究，近十几年来曾先后出版了教材与各种学术论著十六种。我对古典文学的各个门类都有浓厚兴趣，而相比之下，仿佛对于古代史传的教学与研究有更多一点的积累。现在综合起来，略谈几点有关的体会：

一，作为一个从事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工作人员，首先必须热爱自己的工作，有事业心与责任心，而且还要耐得住辛苦与清贫。古代的文化是必须有人研究的，古代的历史经验是必须认真总结的。为什么在大讲“改革”、“开放”的今天，为什么在许多人都已经把这些研究对象看成“破烂”，把这些研究工作看作“大不入时”的情况下，国家还要组织人来干这种事情呢？很简单，就是因为它有用。古代文学、古代历史这种课程，在学校里是千年万载

永远要开下去的，别说是今天，就是古代极封闭、极落后的封建统治者也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今天是在建设“四化”，是在抓紧时机地建设我们的国家，而一群对于古代文化知识、对于古代历史经验缺乏深刻理解的领导与群众，是不可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国家的。我们身在这个岗位的工作人员有坚守这个岗位的责任，就如解放军镇守边防日子又穷又苦一样，相比之下，我们的境遇还好得多呢！倘若再以古人为例，孔子是大学问家，但却一辈子到处碰壁、受穷；司马迁是大学问家，差点把命都搭上了，他们的目的是想作什么呢？无非是想把他们所掌握、所认为的“真理”宣传出去，推广出去。于是他们就如此坚定、如此挚着地“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至于“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了。古代的大圣贤、大英哲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呢！我们的问题只不过是经济上的清贫与事业上的不为世人所看重而已。人活着总要有精神，有点理想，什么事业都需要有一批为之奋斗，为之献身的人。如果连这一点也解决不了，那还能讲什么别的呢？“你这样一说，是不是会更加把人吓跑，今后更没有人愿干这一行了？”是的，吓跑胆小的，剩下的队伍会更精悍、更统一，战斗力会更强，会更少出版一些单纯为了赚钱而粗制滥造出来的“伪劣次品”。而真正对此有志的青年，是不会被吓跑的，我完全相信这一点。

二，研治古典文学，必须先学好历史。我所从事的专业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典文学的品类极其繁多，诗、词、散文、小说、戏剧，它们没有一样不在世界文化的长河上高标远树，风骨凛然。如果是作为一个青年，究竟应该先从哪里学起呢？我的体会是：先从历史入手。这是我当年在复旦大学作研究生时，我的指导老师蒋天枢先生教给我的。当时我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之托，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中国文学史，针对我当时只是一个本科毕业生，而且又在上学时被政治运动占去了许多时间，各种基础知识都还很不扎实的现状，蒋老师提出，让我用两年的时间读“前四史”，或者是读《资治通鉴》。经过考虑，我选择了“前四史”，

为了读这几种书，也的确是占用了我两年中的主要学习时间。究竟有多少好处，由于水平所限，我当时是缺乏认识的。但有一个很现实的情况是：从此我培养了一种读历史的习惯和兴趣，当然也具备了一定的阅读这种典籍的经验和能力。于是在以后的十几年间，尽管“文化革命”动乱不休，但我却总是抽空就读历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通鉴》，以及当时中华书局新出版的“前四史”以外的其他“正史”和若干种“纪事本末”，差不多都是我在那个时期读的。尽管读得一知半解，不深不透，但我觉得对于我后来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作为一个高校古典文学教师的知识积累，无疑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教学与研究能力的提高，到现在我才突出地感到了当年蒋先生教导我三年研究生期间用两年读“前四史”的重要。

现在我也快要成了“老”教师，我时常给本科学生或研究生开设《史记》或是古代传记文学方面的专题课，我给学生提出的教学目的有三条：第一是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第二是学习如何处世，如何作人。我常见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号召学生为建设祖国、为实现“四化”学习，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我认为：为建设祖国，首先必须让学生的头脑聪明起来，要让他们能够明辨是非，识别真伪，而不能再作什么“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不能再让他们成为一种可以随便受人愚弄的盲目力量。一个青年怎样才能更快地在思想认识上成熟起来？鲁迅说过：“读经不如读史”；他又说：“学了历史来看现在，有如隔岸观火。”今天是昨天的继续，今天所发生的政治、军事、经济、法律等方面的一切事情，在古代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都发生过，只不过是形式、面目或辞语上略有一点小的变化而已。面对这样一个纷纭变化的世界，一个人应该选择怎样的人生态度呢？想为国家民族干一番事业是好的，但自己必须先得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基石。这一点看不准，选不好，则你有通天的本领，也许会更加南辕北辙地越干越坏，这种历史教训对于我们这一辈人来说，实在是太惨重，太多了。搞社会科学、搞文学的人，不是光学一些理论教条，不是光会读诗吟赋就行了，他

们还必须要有社会实践、有人生阅历的丰富积累与体验。一个人怎样争取能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得更多的人生阅历与体验呢？这就只有读历史。199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全国《史记》讨论会上，刘乃和先生在她的发言中说道：“我认为，作为一个师大历史系的毕业生，如果对《史记》基本无知，或是知之甚少，那将是我们师大的耻辱。”刘先生很客气，因为她是历史系的，所以只针对历史系而言。而我则说：中文系也一样，甚至其他文科各系也都应该向学生提出这样的要求。

开设《史记》课的第三个目的，我是想通过讲授这门课把学生们已经学过的先秦两汉文学提点起来，给他们展开一个广阔的、丰富可感的时代背景，从而加深他们对以往学过的诗歌、散文、辞赋等文学作品的体验，并想由此培养起学生读历史的兴趣，让他们触类旁通地也能去对唐史、宋史、明清史等下功夫读读。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对唐诗、宋词，以及戏曲、小说等有更加深切的体会，才能对它们做出更加准确的解释与评述。范仲淹曾在他的《渔家傲》词里写道：“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熟悉北宋历史和范仲淹生平的人，是不会把这首词单单当作一首思乡怀人的作品来读的。

三，作学问开始时要有点有面，点面结合。有点就是有重点，有自己下功夫最大、体会最深的部分，这就如同革命斗争必须有一块根据地一样，不然就会成为“流寇主义”，成为万金油。当年刘盼遂先生和我谈到这个问题时，曾用了一个非常浅显、非常生动的例子，他说：“作学问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但是开头你必须有一个小雪球作为核心，不然滚不起来的。”但是一个人的知识学问，又不能范围太狭窄，任何一种建筑的高度都必须建立在一定广度的基础之上。当年在复旦大学上学，有一次春节我们去看刘大杰先生，刘先生谈到这个问题时，蹶着他手中的拐杖说：“就如这根棍子，就是这么细，你让它长得太高，办得到吗？”这就是两位大学问家给我们所谈的点与面的关系。当然，不同层次的人，点与面的绝对值是大不相同的，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都有

他们各自不同的点与面；我们作为一个普通教师，一个普通的科学研究人员，也有我们自己的点与面。事实上我们努力经营了几十年的所谓“点”，比起人家那些大学问家的最边缘的细枝末节来，恐怕仍不知道要浅薄多少倍，这也是自然的。一个大学问家、大艺术家，由于他的某个方面太突出，太被人知，于是他的其他方面的杰出成就便往往容易被他自己最突出、最被人知的方面所淹没，这在历史上是很多的。这就是大学问家们的点与面了。

也正是鉴于对以上问题的理解，我觉得一个有志于从事古代文史研究的青年同志，包括大学生和研究生，开始应该选好一个有重要价值、有相当分量的研究对象作为点，在研究这个点的时候，一方面要对这个点的本身，力求尽量“深透”；但事实上这又是不可能的，这就必须同时对与这个点有关系的四周问题进行研究。这样周回往复，相辅相承，逐渐扩大。以后即使再搞其他表面看来似乎与此毫无关系的问题，我们到时候也会不由地与这个点互相联系、互相比较，会不由地取得举一反三的效益。根据地一旦较为牢固之后，也就有了远途奔袭敌人，甚至进行某种外线作战的能力，也就可以去研究解决其他新的问题了。

四，必须关心现实，关心当前政治、历史、文化、学术发展的现状。搞古典文学、古代历史的人，是不能不关心现当代文学与现当代历史的，因为第一，现当代的文学与历史是古代文学与历史的发展和继续，明白古代才能够更好地明白当前；反过来，明白当前也大大有助于理解过去，一场“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使我们顿然理解了许多过去读古书读不懂的东西。第二，研究古代文学与古代历史，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总是要为发展、建设我们的今天服务的。也只有这样，我们的学术才能有我们今天的时代色彩，才能为今天的人们所关心、所看重，单纯的为古而古，是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的。前几年郭预衡先生指导古典文学研究生读书，他要求他们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读《鲁迅全集》，这确实独特而又高明。鲁迅先生不仅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宗匠，而且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大师，他站得高、看得透，往往一句两句就能

揭出问题的要害，使人拍案叫绝。所以我也觉得我们这些研究古典文学的人必须首先熟悉鲁迅。同时我们也必须大体上了解我国以及外国当代比较著名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电视等。第一是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从中进行比较，发现规律；第二是通过这些来达到与当前社会、当代青年一代的沟通。因为听我们讲课的学生和看我们所写文章的读者都是当代人，都生活在当前的这个社会氛围里，他们所广泛接触、所耳闻目染的就是这些东西，如果我们对此不熟悉、不了解，那我们的讲课、我们的文章就要和青年一代产生隔阂，就缺少共同的语言，就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于是我们的工作就会失败。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作为一个教师，这不是小问题。

五，必须不停地学习，尤其应该注意向青年一代学习。我的知识本来就不多，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眼界的不断开扩，我觉得自己像是越来越无知了。再加上近十几年来，我国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发展变化又是这么多这么快，真叫人应接不暇。新的领域自不必说，即以最古老的《周易》与《诗经》而论，那么多的新说法，就已经够让人头晕目眩了。我很幸运我有一个非常方便的学习环境，比如，当我一有问题拿不准，我便可以向我们教研室的启功、郭预衡、聂石樵、邓魁英等老师请教。我觉得只要听听他们的意见，自己便似乎有了主心骨。我还有一些得力的师兄，如匡兴、祝鼎民等，他们都经常在外国文学、目录学等方面为我充当参谋顾问，为我解惑答疑。此外，我身边还有几位经常在现当代文学、在文学理论方面给我以教益的师弟，这就是王富仁和王一川。我前面说过，研究古代文学、古代历史必须密切关心现当代的文化思想动态，必须明白当前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中的主要问题，这一点我在进行我的基础课、专题课以及研究生课的教学时就分外注意了：在批改学生的作业，在倾听学生的发言，在和同学们的私下交往中，我很注意了解他们班上在传看什么热门书，他们寝室里在热烈争论什么问题，以及他们在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上有什么新看法等等。韩愈讲过：“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

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话说得简直妙极了。我实实在在地从我的教学对象那里学得了许多非常新鲜的东西，他们帮我找来了许多青年们争相传看的抢手书，使我及时地了解了許多文化思想方面的新动态。王富仁与王一川都是我系最有作为的中青年教师，他们眼光锐敏，分析问题角度新颖，理解深刻，而且又都有很好的理论修养，这是我所远远不及的。早在他们当博士生的时候，我们就是朋友，我们时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几年来王一川同志经常把他认为好的对我有用的新版理论书籍推荐给我看，使我受益相当大。从这个角度讲，如果说我这几年能在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有所收获的话，那完全是由于“转益多师”，完全是大家帮衬的结果。

早在几年前，柴剑虹同志就说让我写一篇有关“治学”的文章，我深感惭愧，深感实在无法与前面写过类似文章的卓有成就的前辈相比，故而迟迟未写；现在柴剑虹同志又要，那就从大面上谈谈我的学习体会吧，故谨述如上。

中国伊斯兰教史的分期

讨论中国伊斯兰教史分期，必须充分考虑到新疆的情况，因为新疆是伊斯兰教最早传入我国的地区之一。当东南沿海的穆斯林还是“蕃客”的时候，新疆土地上已经有了中国自己的穆斯林；经新疆传入甘青的伊斯兰教派（主要是苏非派），对中国伊斯兰教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今天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数和民族，在全国各省（区）中都居首位。由此，我们认为：①唐宋时期是伊斯兰教传入我国的初期，其传播区域主要在边疆；②元明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在内地成为有影响的宗教，在新疆占了优势；③明末至清末，伊斯兰教和中国信教民族密切结合，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④清末至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为伊斯兰教史的第四个时期；⑤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了中国伊斯兰教史的全新时期。

（摘编自李松茂著《回族伊斯兰教研究》）

古代论说文的起源和发展

“理形于言，叙理成论”（《文心雕龙·论说》），论说文，简言之，就是分析和说明事理的文章。中国古代论说文源远流长，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中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论说文也不例外。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为活跃、最为繁荣的时代，所谓“处士横议，百家争鸣”。面对社会剧烈动荡的现实，总结经验，分析形势，提出政治主张，成为各派政治力量，各阶层的迫切需要。春秋末年，孔子率先授徒讲学。此后讲学著述蔚为风气，逐步形成了儒、墨、道、法等各种不同的学术派别，也即所谓“诸子百家”。中国的论说文，便是从最初的诸子讲学语录逐渐发展形成的。像《论语》、《老子》、《孙子兵法》等著作，就是以语录体、格言体为主要形式，特点是文字简练质朴，篇章短小，内容包含有深刻的哲理，但论述尚未充分展开，并未构成文章。如《论语·季氏将伐颛臾章》，在《论语》中算是较长的篇章了，但也只有几百字。篇中孔子猛烈抨击了季氏将伐颛臾国的行动；对冉有等身为辅臣不仅不加以劝阻，反而为季氏狡辩的行为，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和理想。

及至《墨子》、《孟子》、《庄子》等著作，虽然全书的篇章仍常常以语录体、对话体的形式出现，但在文章上已初具论说文的规模。其中《墨子》一书是墨子的讲学记录，由其弟子按照内容主题编撰而成，成书也较晚。墨子的论辩以富于逻辑性而著名，《墨子·小取》还曾总结了一套完整的论辩方法。这些方法也体现在《墨子》的篇章中，如《非攻》，其上篇由小及大，层层推理论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孟子》一书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撰，基本上仍属语录体，但明显可以看出逐渐向论说文过渡的特征。如《齐桓晋文

之事》一篇，孟子所言依据一贯思路，抓住对方心理运用生动、形象的比喻，层层深入，有理有据，逐步辩驳论述，劝说齐宣王放弃“霸道”而行“王道”，描绘了自己“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的社会理想。文章形式上是孟子与齐宣王对话，但已初具论说文雏形。《庄子》中多数篇章仍留有明显的对话和语录的痕迹，但体制更加完整了，有的篇章如《齐物论》还直接以“论”名题。像著名的《逍遥游》，已经可以看作是一篇较为成熟的论说文了。

战国末期的《荀子》、《韩非子》就不局限于对话体的论说了，而开始围绕某一中心议题进行论证探讨，如《荀子·天论》，《韩非子·难一》等篇章，文章结构严密，可以说最终完成了诸子散文从语录体、对话体向单篇论说文的过渡。

纵观以说理为主的先秦诸子散文，从《论语》到《荀子》、《韩非子》，正反映了一条中国古代论说文由胚胎到成熟的过程。从思想史上讲，它们是百家争鸣的产物，反映了不同学术派别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文学上，诸子散文各具特色，也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论语》雍容质朴；《墨子》富于逻辑性；《孟子》的气盛雄辩；《庄子》的汪洋恣肆、挥洒自如等等。如《逍遥游》中的超凡想象，驰骋纵横，上天入地，另有一种雄奇气势。《齐桓晋文之事》或诱导，或驳斥，加之形象的比喻，咄咄逼人，极富鼓动性。善于运用寓言、运用形象思维作为论证手段，也是诸子散文中的一大特点，庄子、韩非子更是个中高手。诸子散文产生于思想活跃、学术自由的时代，他们文风各不相同，其文亦无定法，广泛运用各种论证手段，写得自由潇洒，举重若轻。无论从思想上还是文学上，先秦诸子散文给后世都带来了巨大影响。

汉代的论说文从先秦诸子散文发展而来，这时已十分完备、发达。各种类型的论说文在汉代都有全面的发展。汉初贾谊、晁错的政论、史论都十分著名，尤其是贾谊的文章，对后世影响很大。如《过秦论》就是一篇十分精彩的史论，渲染铺排，气势磅礴，至今仍脍炙人口，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汉代不容忽视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的篇幅短小的史论。作为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

想家，司马迁有着超越时代的思想和胆识，他的史论无论思想还是语言都十分精彩，自然也引起封建正统卫道士的不满，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其实正因为如此才更体现了司马迁的伟大之处。如《项羽本纪赞》和《游侠列传序》等都体现了司马迁不囿于传统的或统治者的偏见，而“成一家之言”的特点。前者在总结项羽失败的教训的同时，既表达了作者的历史观点，又寄托了作者的情感。对于游侠，不论儒家、还是法家，尤其是统治者都持否定态度，所谓“侠以武乱禁”，而司马迁独树一帜，在《游侠列传序》中对儒家人物尤其是封侯拜相的权贵者表示了极大的蔑视，而对游侠身上的闪光之处给予了充分肯定。

随着文学的发展，人们对文学的认识也逐渐深入，论说文中也出现了关于文学的学术论文。班固《诗赋略论》作为《汉书·艺文志》诗赋类的序文，主要评述了在汉代蔚为大观的赋这一体裁的大致状况，从中可以体会到汉代人对于赋的看法以及对文学及其功用、价值的看法。而曹丕《典论·论文》则是古代文论的开山之作。它产生于“文学的自觉”的时代，反映了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已经从量变到质变，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大约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对文体进行区分和研究，从《典论·论文》到晋陆机《文赋》开始涉及文体论，而比陆机稍后的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李充《翰林论》则开始专门研究文体，直至《文心雕龙》；其中对论说文也划分了许多不同名目。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论说文在文风上也深深带着时代的烙印。赋体流行于汉代，如贾谊的赋作就很著名，作为史论的《过秦论》，全文也以赋的手法铺排渲染，后也就有人直接将其目为“赋体”。对偶句在先秦就已出现，东汉散文在辞赋的影响下更加注意对偶，到魏晋时就呈现出了散文骈体化的趋势，并初步形成了骈体文。骈，是并驾齐驱的两匹马，在文章上，骈是相对于散而言，骈体文正像“骈”一样两句两句地对偶，在声律上讲究平仄，还讲究运用典故和华丽的词藻。三国时的文章仍以散为主，夹杂一些骈句，到了晋代则演化成几乎通篇骈俪了。如干宝《晋纪

点论》是一篇著名的史论，但写法上已完全骈体化了。到了六朝，骈体文形制更加严密，直至初唐，骈体文一直广泛流行，几乎无文不“骈”。奏章疏议各类文章都采用了骈体文的形式。

骈体文的出现丰富了文学体裁，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作品，但它过于追求语言的形式美，易失之于华而不实，对偶声律的讲求，也束缚了文章本身的发展，因而很早就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但直至“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还有时代稍后的柳宗元，配合儒学复古思潮，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尤其是在实践上大力倡导写作古文，才真正冲击了风靡八代数百年之久的骈体文，文坛面目为之一新。韩、柳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章的社会功用和价值。韩愈声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宣扬“惟陈言之务去”，讲求“文从字顺”，辞不己出。韩、柳的崇古在于创新，在于荡涤文坛的浮靡之风，他们并非照搬古人语言，而是力求创立一种融化古人语言，同时又接近当时口语的新的书面语，用于散文创作。他们的论说文，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韩愈还在传统的论说文中，开创了“解”、“原”等体。韩、柳在论说一类文体的创作中，留下了许多传颂不衰的名篇佳作。如《师说》，韩愈针对当时耻学于师的风气，反复阐述从师之重要，指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只要“道之所存”，皆可以为师。文章以朴素的语言将道理论证得透彻而浅显易懂。柳宗元的《读封建论》是一篇著名的政论文，面对当时藩镇拥兵自重、分裂割据的现实，从历史上、理论上论述了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统一的重要性。《捕蛇者说》则根据实地调查，写出农民备受欺凌的疾苦，艰苦而危险的捕蛇相形之下还是美差，果然如孔子所说“苛政猛于虎”。韩、柳都积极从古人那里汲取营养，兼收并蓄，极大地丰富了古文的表现力，他们创作题材多样，手法多样。如《进学解》，韩愈仿照扬雄《解嘲》的形式，骈散结合，行文新鲜活泼而富于变化，语言精练生动。韩、柳所谓“明道”，就是参与社会政治，参与现实生活，韩愈还提出了“不平则鸣”，这也实际上为“明道”说更增添了现实因素。强烈的现实精神与鲜明生动的语言、丰富灵活的创作手法，正是韩、柳散文

所以取得突出成就和巨大影响的奥秘之所在。他们的创作活动为散文艺术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韩、柳古文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取得了重大成就。但骈文也在自身变革中有所发展。直至北宋中叶再一次掀起的古文运动，才确立了韩、柳古文的传统。欧阳修是当时文坛领袖，也是这次古文运动的“宗师”，三苏、曾巩、王安石都出自他门下。欧阳修的散文曾学韩愈，但风格明畅简洁，平实朴素。他的说理文如《朋党论》写得理直气壮又从容不迫，心平气和又鲜明尖锐，对朝廷有人以“朋党”之名攻击范仲淹改革之事，进行了有力的驳斥。结构谨严、语言明快。《五代史伶官传序》是一篇著名的史论，文中叙事说理紧密结合，总结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历史教训。上述两篇文章都反映了欧阳修论说文所特有的风格。王安石是北宋著名改革家，也是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政论、史论体现了他的风格，观点鲜明，语言简练，逻辑性强。如《读孟尝君传》写得大起大落，抑扬顿挫，新颖动人，极富独创性。苏轼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集大成者，他的散文在唐宋散文名家中独树一帜，文理自然而又恣肆纵横，气势充沛流畅而又富于曲折变化，是宋代散文的杰出代表。如《留侯论》以严肃的议论开始，却以闲笔收尾，含蓄深刻又饶有趣味。再如《日喻说》采用多种比喻，说明术道必须依靠自己的认识和实践这样一个难免写得枯燥的论点，却写得精美别致，既生动有趣又发人深省。此外，苏洵、苏辙、曾巩在古文运动中表现亦很突出，也创作了许多比较好的论说文作品。宋代古文运动的作家们与韩、柳相比虽然社会条件不同，地位也不同，但其作品的强烈的现实感却是一样的，善于在秦汉古文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也是一样的。如欧阳修还将骈体文的四六句的形式进行改造后融于散文的创作，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明代人开始把韩、柳与上述六位宋代文学家并称为“唐宋八大家”。这八大家的确在中国散文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他们的创作活动，不仅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而且把古代论说文的创作也推向了最高峰。

元代的散文是宋代散文的继续。明代论说文的发展则深受当

时文风的影响。针对明代初期平庸芜弱、粉饰太平的合阁体散文，前、后七子打出拟古、复古的旗帜，宣扬“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李梦阳声称要像临摹古帖一样模拟古人诗文，文坛上弥漫着摹仿剽窃的风气，他们的复古与唐宋古文运动的以复古为创新有着本质不同。他们只知照抄古人现成字句，字摹句仿，泥古不化，最终将文学创作引入死胡同。

在前、后七子之间，唐宋派起而反对拟古之风，他们提倡学习“唐宋八大家”散文的法度和平易自然的风格，其代表人物茅坤编了《唐宋八大家文钞》作为样本，其中评语批点对散文艺术技巧的分析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唐宋派由于自身的局限，导致一些人在形式末节上模拟唐宋散文，又沦于另一种拟古。这样后七子趁势而起，拟古之风又甚。

明代社会的特点是市民阶层的壮大，在新的社会矛盾和市民思想影响下，产生了反抗传统、追求个性解放的新思潮，如泰州学派大胆肯定人们的生活欲望，向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挑战。李贽是后期的杰出代表。如《题孔子像于芝佛院》，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他的思想。袁宗道兄弟受这种社会思潮尤其是李贽的影响，他们以“变”、“真”的观点，和“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口号，猛烈地扫荡拟古陋习。他们主张真实情感，主张使用当时语言表现独创精神，反对虚伪矫饰，因袭模仿，反对陈规旧套，是为公安派。如袁宗道《文论》反映了公安派的文学主张，文中主要论及文章与口语的关系，时代不同，语言也就不同，所以辞贵达意，要使用当时的语言，使用口语创作。明代的唐宋派和公安派的文学主张都曾给清代的文学以影响。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的论说文作品尖锐深刻，切中时弊，十分精彩。黄、顾二人都是明末与宦官为代表的黑暗势力斗争的东林党和复社的代表人物。面对当时深刻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尤其是明亡的教训，他们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如黄宗羲《原君》是一篇极著名的政论文，痛快淋漓地抨击了维持了近两千年的封建君主制度，文笔犀利，富有民主色彩，为清末维

新运动和革命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

清末著名的散文流派当属桐城派，经方苞开创，中经刘大櫆、直至姚鼐，历经百余年，终于形成了有完整系统的文学主张的桐城派。他们通过唐宋派上追韩愈，鼓吹程朱理学，形式上企图建立一套作文法则。方苞讲“义法”，即通经明道，宣扬义理（孔孟程朱之学），姚鼐讲“义理”、“考据”、“文章”的结合，他们认识到文章的内容比形式更为重要，形式为内容服务，随内容的变化而变化。他们不仅有较为系统、完整的理论，而且以他们的创作实践来说明和光大这些理论。桐城派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清末，其在艺术上讲究文字简洁、结构严谨，确实有其可取之处，也曾起过起衰就弊的作用，虽嫌保守，也留下了许多佳作。然而对“义理”的追求，却成为以后维护封建社会崩溃的卫道士们的法宝，因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被目为“桐城谬种”。

清代散文尤其是论说文最有成就的是龚自珍，他生活于鸦片战争前夜，面对封建制度行将崩溃的现实，他渴望改革，写了大量政论文，这些文章见解卓越深刻，文笔生动犀利，也使他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作家。比如《平均篇》，是龚自珍看到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后，探讨了历代治乱兴衰的原因，反映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

清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维新思想家的政论文也取得了重要成就，面对列强的欺凌侮辱，大清帝国的软弱腐朽，他们的政论文或抨击旧制度，或提出改革方案，或激励民气，极富感染力和鼓动性。如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充满爱国激情，既有痛快淋漓的揭露，又向人们展示了光明的未来，激烈地抨击了造成国家衰败的清朝统治者，热情描绘了一幅壮美的少年中国的图景。语言明白晓畅，形式舒展自如。他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郭沫若语；见《少年时代》），梁启超在当时写了大量政论文，为开启民智起了重要作用。爱国、救国、改良、革命，构成了清末政论文的主旋律。这些政论文在许多方面都给此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乃至早期共产党人以很大影响，为中